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专题】

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 ——从“斯基泰”与“萨卡”概念反思谈起

邵会秋^{1,2}, 李柯凝¹

(1. 西北大学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 2.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本文以早期游牧研究中长期使用的“斯基泰”与“萨卡”概念为切入点,梳理二者生成背景与学术演变,并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对其具体内涵加以辨析。文章指出,“斯基泰”与“萨卡”均源于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人群的他者命名,之后被不断泛化,用来涵盖不同区域、不同内涵的早期游牧遗存,从而模糊了各地人群在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发展轨迹上的差异。对早期游牧的研究不宜以文献族称或宽泛概念直接指代复杂考古材料,而应回到考古遗存本体的基础上讨论族群、交流与历史过程。对“斯基泰”与“萨卡”概念的反思表明,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应立足实物材料,重视区域差异,辨析外来概念的适用边界,并在跨区域比较中形成更符合草原历史实际的考古学解释。

关键词:斯基泰; 萨卡; 早期游牧文化; 草原考古; 构建自主叙事体系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6-05-002

一、引言与问题的提出

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分布着众多早期游牧人群,其文化面貌与南部农耕文明形成鲜明差异。游牧社会所具有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使其在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人群大多未形成自身的文字系统,现存相关历史文献几乎均出自与其接触的农耕文明。由此,早期游牧人群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邻农耕社会的记述。这些记载不仅数量有限、内容零散,而且往往带有“他者”视角下的主观判断和认知局限。至于分布于更北部地带、未与农耕文明发生直接接触的游牧群体,则几乎完全缺席于历史文献之中。

与文献匮乏形成对比的是,考古发现揭示了同一时期欧亚草原游牧遗存数量庞大、文化特征鲜明且地域差异显著这一现象。因此,将文献中零散、模糊的族群称谓与考古发掘出的具体物质遗存相对应,成为一项至关重要却异常困难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斯基泰”(Scythian)与“萨卡”(Saka)等源自古典文献的概念,在学术使用中不断被泛化与移植,这不仅阻碍了早期游牧文化研究的深入,对中国学者开展北方边疆考古和草原考古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5-12-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亚洲中部干旱区丝路沿线青铜时代文化格局与互动研究”(23AKG009);
“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资助项目(2024-267)。

在此背景下,本文拟从考古学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早期游牧研究中的“斯基泰”与“萨卡”概念。文章并非仅对两个术语作名词辨析,而是以此为切入点,讨论考古研究如何处理草原早期文献称谓、外部叙事与考古遗存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这一讨论,进一步厘清相关术语的使用边界,促进早期游牧研究中的学术对话,并为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提供一个具体观察角度。

二、古希腊文献中的“斯基泰”及其考古边界

“斯基泰”是欧亚草原地区最著名的早期游牧人群,“斯基泰文化”这一概念应用也极为广泛,直到今天仍有研究将欧亚草原多地早期游牧遗存笼统称为斯基泰文化。“斯基泰”的闻名,主要是因为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著作《历史》中写入了大量关于斯基泰人的记载,包括斯基泰人的来源、分布范围、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斯基泰人与波斯人战争的过程^[1]。而在黑海北岸和库班河流域很早就发现有随葬大量金器和青铜器的墓葬(图1),这些墓葬及其随葬品具有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因而被学界与文献中的斯基泰人联系起来。斯基泰人在古希腊时期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不仅与希腊人广泛接触,还在近东地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很多古希腊人眼中草原上游牧部落大都属于斯基泰人。古希腊斯特拉博(Strabo)的《斯特拉博地理学》记载,斯基泰等游牧部落占据着整个北方地区,“从里海开始的大部分斯基泰人被称为大益人,那些居住更靠近东方的部落与他们不同,被称为马萨格泰人和塞种,其余的所有部落则统统称为斯基泰人,但是每个部落还有他们自己单独的名字,他们大部分是游牧部落”^[2]^[96]。在这个记载中,斯特拉博将草原游牧人群统称为斯基泰人,但单独提出了马萨格泰人和萨卡人,并强调各个部落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名字。而阿里安(Arrian)《亚历山大远征记》中也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主要看法,将草原上的游牧人群都称为斯基泰,并将斯基泰人分为“欧洲斯基泰”和“亚洲斯基泰”,还单独描述了“阿比亚斯基泰”^[3]^[137-140]。直到今日,这种认识的影响仍然很大,国内外很多成果中对于“斯基泰”这个概念使用仍比较随意,与斯基泰人无关的一些早期游牧文化都被冠以斯基泰之名。



图1 斯基泰文化的特色金属器

1. 金胸饰;2. 金鹿饰;3. 金豹饰;4. 铜杆头饰

(1,4 采自 Ellen Reeder. Scythian Gold: treasure from ancient Ukraine,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9, Inc. 第 327 页,图 172、第 143 页,图 38;2 采自 Joan Aruz, Ann Farkas, Elisabetta Valtz Fino.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6, 第 57 页,图 12;3 采自 Karl Jettmar. Art of the Steppes,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64, 第 34 页,图 5)

在《历史》的记述中,希罗多德对于斯基泰人的起源、发展与分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关于斯基泰人的来源有多个版本,其中有一些和神话传说有关,希罗多德认为其中最为可信的是斯基泰人原本是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人群,但在伊塞顿人(Issedones)和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的压力下,向西迁徙到了黑海北岸,在那里斯基泰人赶走了原住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并追击他们进入了小亚细亚的米底王国^{[11]270-271}。所以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就是欧亚草原地区众多游牧文化中的一支,由于战败被其他游牧人群赶走,迁到了黑海北岸和小亚细亚地区,其他游牧部落也有自己的名字如伊塞顿人和马萨格泰人等。

而从目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看,典型的斯基泰文化对应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地区。在这一区域同样发现了许多斯基泰文化的大型墓地,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风格是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其中尤其是动物纹风格,在斯基泰文化中格外引人注目。在斯基泰文化的早期阶段,动物纹装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具有斯基泰人群自身特色的艺术风格,所描绘的题材主要有蹲伏或卷曲的豹、平卧的鹿和山羊、大嘴的鸟或鸟头等;第二类动物纹图案是近东地区常见的装饰艺术题材,包括带翅膀的怪兽、牛和狮子的合体、格里芬以及花和树等。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在黑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希腊的殖民地,希腊人用彩陶花瓶、纺织品、装饰品、武器、美酒、橄榄油等换取斯基泰人的羊毛、兽皮、奴隶,正是从那时起,希腊艺术在斯基泰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大,西亚亚述艺术风格的因素则逐渐减少,同时斯基泰动物纹艺术变得更加复杂,其装饰艺术也融入了部分萨夫罗马泰和波斯文化因素。公元前4世纪之后,斯基泰文化与周邻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其中希腊文化对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最为重要,这个时期动物纹装饰中很多早期和中期的题材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希腊化主题,器物上开始表现神、英雄和宗教场景^{[14]212-220}。此外,在这一分布区还发现了属于前斯基泰文化的遗存,这些早于斯基泰文化的遗存年代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15],很有可能就属于希罗多德笔下被斯基泰人赶走的辛梅里安人。

在斯基泰人分布的东面是萨夫罗马泰人(Sauromatian),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述了萨夫罗马泰部落与斯基泰部落关系密切,其主要分布在顿河以东,距离亚速海北部有3天路程的地方^{[11]307-310}。而且他还强调了萨夫罗马泰女人的特殊之处,“也作战并且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在她还没有杀死敌人的一个男子的时候是不允许结婚的。有一些妇女直到老死而不结婚,因为她们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11]310}。这一特点在考古发现中亦有较为清楚的体现。萨夫罗马泰文化墓葬中,男女墓葬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突出。已有发掘资料表明,随葬武器的女性墓比例超过20%,而作为殉牲的马骨也并非男性墓所独有,在女性墓葬中同样有所发现,这一现象与其他游牧文化相比具有较明显的特殊性。从目前考古发现看,萨夫罗马泰人的活动范围主要位于斯基泰文化分布区以东,集中在里海北岸及西哈萨克斯坦地区^{[16]105}。由此可见,典型斯基泰文化的东界大体未越过伏尔加河流域,更不能将乌拉尔以东的亚洲草原遗存直接归入斯基泰文化。

综上所述,无论从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记载看,斯基泰人的分布和活动范围都相对清楚,主要集中于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繁盛时期其影响范围曾扩展至高加索及西亚北部地区。与此同时,斯基泰文化在墓葬形制、随葬组合和动物纹艺术等方面与欧亚草原其他早期游牧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由于古希腊人对邻近的斯基泰人较为熟悉,而对更遥远地区的其他游牧人群缺乏深入了解,便将这些经济方式相近、生活形态相似的游牧群体统称为“斯基泰人”。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东部萨尔马泰文化的兴盛及其迅速西扩,大部分斯基泰人逐渐融入萨尔马泰文化之中,作为独立考古学文化的斯基泰文化也随之走向衰落。因此,“斯基泰”可以作为理解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早期游牧遗存的重要历史概念,但不宜直接扩展为涵盖欧亚草原全域早期游牧文化的总称。

三、文献中的“萨卡”及其中亚考古内涵

“萨卡”是指公元前1千纪活跃于中亚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人群,古代文献中对于这些早期游牧人群缺乏详细的记载,但由于古代波斯人与他们接触最多,留下了一些相关记载,波斯人称他们为 Saka 或 Sacae(萨卡或萨迦,本文统一为萨卡)。

波斯人与萨卡人的战争始于阿契美尼德帝国居鲁士二世(前558—前530),斯特拉博在《地理学》中提到居鲁士曾远征萨卡部落,但是在战争中被打败了,假装逃走时在扎营的地方留下了给养,包括大量的各种物资,特别是美酒,当萨卡人追来时,发现这个营地已经空无一人,还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享用的东西,于是他们喝酒庆祝,居鲁士这时率兵返回,几乎把这些萨卡人都杀光了^[21967-968]。这个故事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有记载,但将居鲁士对战的对象变成了马萨格泰人,居鲁士越过阿拉克赛斯河(今锡尔河)诱杀了三分之一的马萨格泰军队,包括马萨格泰女王托米丽司的儿子,但之后在决战中被马萨格泰人击败,居鲁士本人也战死了^[11106-107]。不过在《地理学》中提到马萨格泰人时又说“马萨格泰人在与居鲁士的战争之中证明了自己的英勇,许多作家反复提到他们的勇敢”^[21968]。因此,这一事件中的马萨格泰人与萨卡人应该是同一人群。从后来波斯铭文的记载看,马萨格泰人可能是萨卡人的一支或者最初被用来指称萨卡人^[715]。

在之后的大流士大帝时期(前550—前486),波斯人已经将其北部的游牧人群都称为萨卡人。据伊朗克尔曼沙赫的贝希斯敦铭文中记载,大流士“率领一支军队攻打萨卡人的领土,而戴尖顶帽的萨卡进犯我。我来到海边,带着所有的装备跨越了阿拉克赛斯河。我杀戮萨卡军队。另一支军队被俘虏,捆绑至我处。萨卡人首领斯坤哈被捕后带到我处。在那里我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了另一个首领”^[7126-27]。而且波斯人还将萨卡人进一步分类,在波斯首都波斯波利斯阿帕丹北面和东面的台阶上,都有外族藩臣携带物品进贡的精美浮雕,其中包括三种萨卡人,即饮豪麻汁的萨卡(图2)、戴尖顶帽的萨卡(图3)和海对面的萨卡^[81122-134]。戴尖顶帽的萨卡和饮豪麻汁的萨卡两个紧靠在一起,似乎表明二者是相邻的,均列在犍陀罗之后,这与贝希斯敦铭文的位置大致相同^[7131]。而海对面的萨卡则与他们不同,这说明在波斯人看来,虽然这些都是游牧人群,但还是有差别的。海对面的萨卡很可能就是指希腊人所说的斯基泰人,因为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卡人^[11494]。《历史》中还记载“属于斯基泰人的萨卡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它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萨伽利司的战斧”^[11494]。这些记载与波斯波利斯阿帕丹浮雕上的萨卡人形象相近,献贡的萨卡人主要装备就是具有特色的战斧、短剑和弓箭(图2),都穿着裤子,头顶还戴着尖尖的高帽(图3)。



图2 阿帕丹北阶第十七图:饮豪麻汁的萨卡

采自李零. 波斯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28页,图2-17)



图3 阿帕丹东阶第十一图:戴尖顶帽的萨卡

(采自李零. 波斯笔记,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 第 134 页, 图 3-11)

从上面的分析看, 波斯人没有斯基泰人的概念, 而是将中亚草原的所有游牧人都统称为萨卡人, 而且萨卡人分为很多支, 其中, 在中亚地区的萨卡人不仅游牧骑马射箭, 佩戴短剑, 还使用有特色的战斧。

在中国的《汉书》中也有萨卡人群的相关记载。《汉书·西域传上》载:“昔匈奴破大月氏, 大月氏西君大夏, 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 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属, 皆故塞种也。”^{[9][388]}《汉书·西域传下》又载:乌孙国“本塞地也, 大月氏西破走塞王, 塞王南越县度, 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 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而乌孙昆莫居之, 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9][390]}。《汉书》中记载的“塞种”和“塞”都处于中亚地区, 有学者认为他们应该是 Saka 或 Sacae 的音译^{[10][10-11]}, 当然从《汉书》所记述的“塞种”的分布范围也可能与波斯人记载的“萨卡”并不完全对等。前者主要地理分布区域在伊犁河、楚河流域以及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虽分布较为分散, 但《汉书》也明确指出了罽宾、休循、捐毒等国都是塞种人建立的国家, 这比波斯人提到的萨卡要具体一些, 也可能说明了波斯人心中的“萨卡”概念更加宽泛。遗憾的是, 中原王朝与萨卡人群没有直接的接触, 因此对其物质遗存也未留下更详细的记载。

对于文献中关于萨卡人的记载较为零散, 现阶段萨卡研究主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苏联学者格里亚兹诺夫 (M. P. Gyzaznov) 等人在里海东部草原地区开展大规模考古工作以来, 相关资料已不断积累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考古研究体系。这些材料大多出自墓地遗存, 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整个中亚草原地带^{[11][193-197]}。尤其是哈萨克斯坦伊塞克金人墓的发现, 将萨卡研究推上了新的阶段。伊塞克金人墓是由苏联学者阿基舍夫 (K. A. Akishev) 1969—1970 年主持发掘的萨卡高等级墓葬^[12], 墓葬中不仅出土了短剑等武器, 还出土了超过 4 000 件的金饰件, 其中包括图案种类非常丰富的 165 件动物纹装饰金器 (图 4)。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 伊塞克金人墓是古代游牧文明辉煌成就最直观、最耀眼的物质象征, 其重要性远超其他的考古发现, 而且金人墓已经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考古瑰宝”, 复原的墓主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哈萨克斯坦国礼、国家宣传与货币图案上, 这也使得“萨卡”的概念在现代考古和国家历史叙事中获得新的影响力。然而, 从考古发现看, 中亚草原地区被归入萨卡遗存的文化面貌有一定的相似性, 但各地区文化也都存在自身的特色, 从考古上可以划分为多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13][293]}。

综上所述, “萨卡”并非一个边界清楚的单一族群名称, 而是波斯文献中对中亚草原多支游牧人群的概括性称谓。萨卡相关考古材料所揭示的中亚早期游牧遗存, 远比文献中的萨卡概念更为复杂, 也更具有区域差异。这一概念与希腊历史文献中的“斯基泰”相似, 两者皆源于农耕文明对北方草原地带生计方式相近的游牧群体的泛称, 体现了古代文明对他者的概括性命名方式。



图4 伊塞克金人墓出土的器物

1. 金人墓主复原图;2. 短剑;3-6. 动物纹金饰件

(均采自 Grigore Arbore Popescu etc. *L'uomo D'oro*, Milan: Electa Publishing, 1998, 第175页, 图270; 第187页, 图331; 第183页, 图305; 第184页, 图320; 第177页, 图275、图273)

四、“斯基泰”“萨卡”概念泛化及其解释困境

从前文的分析可见,“斯基泰”与“萨卡”本有各自的文献来源和历史语境,二者都不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群的自我命名,而是周邻农耕文明在特定接触范围和认知边界内形成的外部称谓。然而,这两个概念已经逐渐脱离原有语境,被用来指称更广范围内的欧亚草原早期游牧遗存。由此产生的问题已不只是术语使用是否准确,而是会进一步影响研究者对草原早期游牧文化格局、区域差异和互动过程的解释。

以“斯基泰”为例,在很多已有的成果中都大量使用这一概念,如斯基泰艺术、斯基泰文化、斯基泰时代等,不仅用来描述黑海北岸典型的斯基泰人群,还被用来涵盖欧亚草原其他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当然这也有其历史根源。正如前文所述,斯基泰文化发现早,遗存丰富,有古希腊历史文献的详细记载,史学家用他们熟悉的、邻近的民族名称来称呼经济方式相近的其他族群^[14]。古希腊人对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又很大,因此“斯基泰”这一概念在20世纪成为早期游牧人群的代名词。1950年,苏联学者阿尔塔莫诺夫(M. I. Artamonov)提出了“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风格”为斯基泰三要素的概念^[15],这使得之后发现的很多同时期拥有相似三要素特征的游牧遗存,都冠以斯基泰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先后出版了《斯基泰萨尔马特时期苏联欧洲部分的草原地带》与《斯基泰萨尔马特时期苏联亚洲部分的草原地带》两本研究早期游牧文化资料性极强的文献,从书名即可见“斯基泰”概念的深远影响。长期以来,草原考古学研究主要由欧美和俄罗斯学者主导,其学术影响十分深远,日韩及中国部分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也常在不同程度上沿用这一概念体系。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对草原历史和考古材料了解不够深入的学者与读者,容易将欧亚草原中、东部早期游牧文化与斯基泰文化直接联系起来,甚至误认为这些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均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

当然,也有学者为区分不同遗存,在研究中提出了狭义斯基泰和广义斯基泰的概念:前者特指希罗多德所记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后者则泛指欧亚大陆范围内的早期游牧人群。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区分的学术解释力仍然有限。一方面,欧亚大陆许多早期游牧文化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并无直接关联,将其纳入广义斯基泰的范畴,容易忽略不同区域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不少早期游牧文化在社会组织、墓葬等级和物质文化方面并不弱于斯基泰人,甚至在某些领域更为复杂。希罗多德的记述中已可见斯基泰人与周邻人群之间的差异与互动,而亚洲草原的考古发现也显示,早于斯基泰文化的高等级王陵已经存在。因此,继续使用此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草原考古学术视角的延续,实际上

仍然以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为参照中心,将其他地区的游牧遗存置于这一概念框架之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释路径,容易强化由西向东的影响模式,而忽略亚洲草原各地区游牧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

“萨卡”概念的使用范围虽然不如“斯基泰”广泛,但在不少研究中也用来泛指中亚草原地区的早期游牧人群。这种称谓同样容易忽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事实上,无论是“斯基泰”还是“萨卡”,都难以概括欧亚草原地区早期游牧人群的复杂面貌。这种概念泛化所造成的解释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会模糊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边界,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各地早期游牧遗存确实存在广泛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他们属于同一文化或同一族群;二是容易强化“中心—边缘”的叙事模式,把草原各地的相似因素解释为某一中心文化向外扩散的结果,而忽视多区域并行发展和相互作用的可能;三是会使文献族称先于考古材料发挥解释作用,导致研究者在材料分析之前,已经用“斯基泰”或“萨卡”等概念预设了遗存的文化属性。

远离农耕文明直接接触范围的亚洲草原材料,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这些人以北的情况,则伊塞顿人说过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的事情。这是斯基泰人讲的,斯基泰人又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而我们又是把我们听来的话信以为真并给这些人起了一个斯基泰的名字,即阿里玛斯波伊人”^[11276]。伊塞顿人和阿里玛斯波伊人(Arimaspians)很可能是古代阿尔泰山区的游牧民族^[16124]。这里已大致达到古代东西方文献所能触及的最远范围。至于更北的图瓦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当地游牧人群的任何记载,然而,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同样存在高度发达的早期游牧文明。以俄罗斯图瓦地区为例,在被称为“帝王谷”的区域内已发掘多座王陵级墓葬,其中,阿尔然二号王冢出土金器5700余件,包括金柄铁剑、包金鹤嘴斧、金项圈以及大量金饰件(图5),仅金项圈即重达1.5千克^[171],除此之外,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容器、武器和马具。这座墓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700年前后,无论从墓葬规模,还是从随葬品的数量与制作精美程度来看,都超过了以往所见许多“斯基泰”或“萨卡”贵族墓葬。这些考古发现提示我们,亚洲草原早期游牧社会并非只能在“斯基泰影响”或“萨卡扩散”框架中加以解释,其自身的发展水平、社会复杂化过程和区域互动网络均应得到独立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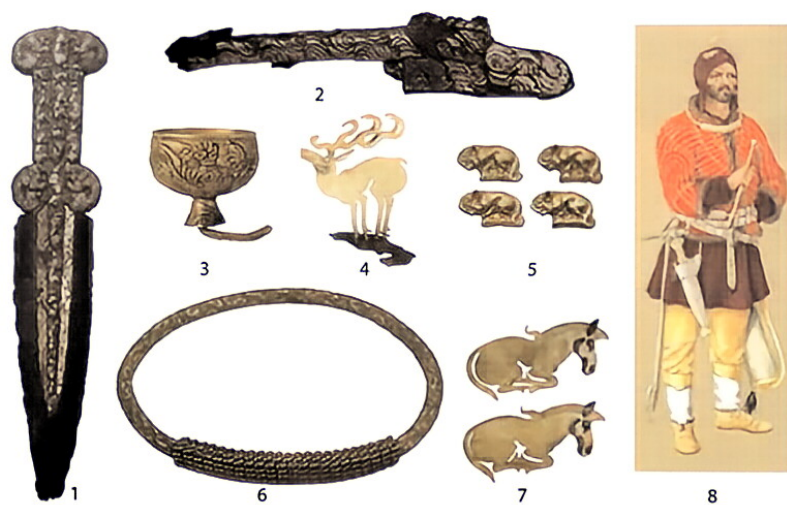


图5 阿尔然二号王冢 M5 男主人复原图与部分随葬品

1. 金柄铁剑;2. 鹤嘴斧;3. 金鍍饰;4. 鹿饰件;5. 野猪饰;6. 项圈;7. 马形饰;8. M5 主人复原图

(1-7 采自 K. B. Чугунов. Аржан - 2: погребально - помина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тувинской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2024, 依次为第 130 页, 图 12、第 148 页, 图 33、第 109 页, 图 71、第 108 页, 图 1、第 119 页, 图 58、第 112 页, 图 5、第 116 页, 图 2; 8 采自 Von Konstantin V. cugunov: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urgan Arzan 2 in Tuva,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 Mainz, Berlin, 2010, 第 212 页, 图 225)

因此,简单地将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早期游牧遗存归入“斯基泰”或“萨卡”这类宽泛概念,不仅缺乏充分的实证基础,也容易掩盖材料本身所呈现的多样性。要走出这一研究误区,关键在于将研究重心从文献称谓和概念标签转回考古遗存本体,在具体材料分析的基础上重新讨论区域文化差异与跨区域互动。

五、立足考古遗存本体: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路径

“斯基泰”“萨卡”概念的泛化,集中暴露出早期游牧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文献称谓与考古遗存之间不能简单对应。类似情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亦十分常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胡人”,便是中原诸国和秦汉王朝对北方草原及其邻近地区人群的笼统称谓,这些被泛称为“胡”的人群实际上包含林胡、楼烦、东胡、义渠、匈奴等不同部族。《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许多中原诸侯国与胡人的互动,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18][2886-2887]};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更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文化接触交融的显著例证。然而,对于同期分布于更北草原地带、与中原未有直接接触的游牧人群,由于缺乏具体认知,中原文献往往仍以“胡人”这一宽泛概念概而言之。因此,当今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不应继续停留在“胡人”这类笼统的称谓之上,正如不宜以“斯基泰”一词简单涵盖亚洲草原各早期游牧人群一样。

《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19][345]}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原人来说,四周的夷、蛮、戎、狄都是不同于自己的野蛮人。具体以“西戎”这一概念为例,文献中记载的西戎实际更多是一个泛称,而从考古发现看目前这一概念下所涵盖在内的相关遗存,其文化内涵、人群体质特征和来源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但脱离对这些遗存本体的微观分析,把他们统称为一个人群,仍然体现的是历史文献中“他者”的视角。在此基础上去谈这些族群的文化内涵和生业方式等会存在很大的问题^[20]。其实已有很多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了反思性研究,如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21]和林沅《戎狄非胡论》^{[22][3-6]}等都为如何认识文献中记载的先秦时期北方族群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因此,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第一步不是创造新的宏大概念,而是辨析既有概念的来源、边界和适用范围。一个文献族称可能包含多种考古遗存,而一种考古学文化也未必能够与某一文献族称直接对应。同样,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等相似因素也不能直接证明不同地区属于同一族群或同一文化。只有先厘清这些概念层次,才能避免以文献称谓概称考古材料,或以某一种器物风格替代整体文化分析。

第二步是立足考古遗存本体。这并不是排斥文献,而是强调考古研究应首先立足于材料自身。对于草原早期考古而言,墓葬特征、随葬品组合、器物类型、动物纹艺术、年代序列以及生业方式,都是建立文化框架的基本依据。只有在这些材料得到充分整理和比较之后,才能判断不同遗存之间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还是只是共享某些技术、风格或生业因素。

第三步是在区域文化框架基础上重新讨论跨区域互动。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各地早期游牧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联系,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艺术在不同区域之间传播,但这种联系不应被简单解释为某一中心文化向外扩散,不同区域可能在相近生业方式与交流网络中形成相似的物质表现,也可能通过贸易、迁徙、战争和技术传播产生复杂互动。林沅教授曾提出“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整个四周地区”^{[23][280]}。这对于理解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群相似性和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对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北方草原考古具有自身的研究优势。中国考古学

历来重视器物组合、地层关系、区域类型和文化谱系的系统分析,这一传统有助于细化北方草原地区不同遗存之间的时空关系。同时,中国中原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还建立了非常细致的文化年代序列,中原文化的器物在判定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方面发挥着重要标尺作用^[24]。当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中国文献替代西方文献,也不在于用中国概念替代西方概念,而在于通过扎实的考古材料分析,建立能够解释中国北方草原的区域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更大范围的欧亚草原文化比较研究。

因此,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并不是拒绝使用“斯基泰”“萨卡”“胡人”“西戎”等既有概念,而是要先辨明其生成语境、指称范围与使用限度。文献称谓可以作为问题线索,但不能替代考古分析;外来概念可以作为比较工具,但不能成为解释的前提。只有在区域文化序列与年代框架得到充分建立之后,族群属性和文化交流的讨论才具有更可靠的基础。

结 语

中国北方草原考古起步相对较晚,但经过数十年的资料积累和分析研究,已经具备从自身材料出发参与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研究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学者更加主动地进入欧亚草原研究现场,既往研究中沿用的模糊概念、固有成见和解释惯性,也有必要在新的材料和问题意识下重新检视。

从“斯基泰”与“萨卡”概念反思谈起,并不是要否定历史文献在早期游牧研究中的价值,而是主张要深入了解问题的关键主体,避免不加考证就去沿袭已有的概念、观点或研究范式。对于草原早期考古而言,真正可靠的出发点仍是考古遗存本身。只有将区域文化序列、年代框架和遗存内涵充分厘清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讨论族群属性、跨区域交流与社会历史进程。草原早期考古自主叙事的建构,也正需在这一意义下开展,在实物资料、区域实践和跨文化比较之间,重新建立解释早期游牧文明的考古学路径。未来,应从夯实中国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基础做起,逐步完善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时空框架。既要摆脱古代文献泛称对现代学术研究的束缚,也要克服西方学术视角长期形成的解释惯性。在此基础上,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立足考古材料、重视区域互动与跨文化比较的草原考古学术体系,从而更真实、更生动地还原欧亚大陆早期游牧文明交融互动的灿烂历史。

参考文献

- [1] 希罗多德. 历史[M]. 王以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 斯特拉博. 斯特拉博地理学[M]. 李铁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 [3] 阿里安. 亚历山大远征记[M]. 李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4] 邵会秋,侯知军. 百兽率舞: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装饰综合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5] 邵会秋,杨建华. 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斯基泰—伊朗动物纹风格的起源》一文谈起[J]. 西域研究,2006(4):73-77,118.
- [6] Maring G. Moshkova.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Sauromatian and Sarmatian Tribes,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C]. CA Berkeley:Zinat Press,1995.
- [7] 余太山. 波斯和古代中亚:读书札记[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8] 李零. 波斯笔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9]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0] 余太山. 塞种史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11] Leonid T. Yablonsky. Written Sources and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e Saka in Central Asia,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C]. CA Berkeley:Zinat Press,1995.
- [12] Акишев К. А. Курган Иссык: Искусство саков Казахстана[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1978.

- [13]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4] 梁云,李文雪. 论安息王室的渊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114-127.
- [15] Артамонов М. И.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кифов [J]. ВДИ,1950(2):37-47.
- [16] Liudmila Barkova. The nomadic culture of the Altai and the animal style, in: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M].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 [17] Чугунов К. В. Аржан-2: погребально-поминаль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тувинской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M].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2024.
- [1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9] 孙希旦,撰. 礼记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0] 邵会秋,宋佳雯. 西戎与胡:从《西戎:东周时代戎族史迹的考古学探索》一书谈起[J]. 北方文物,2025(5):108-112.
- [21] 王明珂. 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1):55-67.
- [22] 林沄. 戎狄非胡论[C]//林沄学术文集(二).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23] 林沄.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C]//林沄学术文集.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 [24] 邵会秋. 北疆考古应突破苏联模式[J]. 历史评论,2025(6):55-60.

[责任编辑 樊丹丹]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Narrative for Early Steppe Archae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s of "Scythian" and "Saka"

SHAO Hui-qiu^{1,2}, LI Ke-ning¹

(1.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Archaeology of the Silk Road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School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ong-used concepts of "Scythian" and "Saka" in early nomadic studie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ir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scholarly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ir specific meanings in light of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t argues that both "Scythian" and "Saka" originated as external designations used by agrarian civilizations to describe northern nomadic groups. However, these terms have been repeatedly generalized and are often used to encompass early nomadic remain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nts, thereby obscuring distinctions among various groups in material cultur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arly nomadic studies should not use textual ethnonyms or broad conceptual labels to refer directly to complex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Instead, discussions of ethnicity, interaction, and historical processes should return to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emselves. 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s of "Scythian" and "Saka"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narrative for early steppe archaeology should be grounded in material evidence, attentive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areful in defin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foreign concepts. On this basis,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can generate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that better correspond to the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the steppe world.

Key words: Scythian; Saka; early nomadic culture; steppe archae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narrative